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知识分子/[美]拉塞尔·雅各比著;洪洁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14-03306-2

Ⅰ. 最... Ⅱ. ① 雅... ② 洪... Ⅲ. 知识分子-现状-
研究-美国 Ⅳ. D77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533 号

The Last Intellectuals by Russell Jacoby
Copyright © 1987 by Russell Jacoby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2000 by Russell Jacob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6-001

书　　名　最后的知识分子
著　　者　[美]拉塞尔·雅各比
译　　者　洪　洁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通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306-2/D·508
定　　价　1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目　　录

致谢 …… 1

前言 …… 3

第一章　消逝的知识分子？ …… 1

第二章　波西米亚精神的衰微 …… 26

第三章　去郊区的路上: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 …… 58

第四章　纽约、犹太人以及其他的知识分子 …… 79

第五章　校园新左派Ⅰ:自由的学人 …… 125

第六章　校园新左派Ⅱ:穿过院校的长征 …… 156

第七章　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 …… 210

致　　谢

我讨厌包罗万象的致谢时尚，因此我要把致谢辞写得简短一些。感谢诺米·格劳伯曼，我坚定的同志和伴侣，还有我的孩子莎拉和山姆，我欠他们的太多了。我感谢保罗·布赖内斯、乔尔·科沃尔、卡尔·博格斯，以及生活在这个大陆各地的那些批评我、反驳我和支持我的朋友们。我特别要说的是，没有雪利·查斯拉夫和在温哥华与蒙特利尔的其他诸君，这一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最后，谨向现已为我编辑三本书的编辑斯坦夫·弗莱瑟致以衷心的谢意。

前　言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编年史家哈罗德·斯特恩斯(1891—1943)在他1921年的著作《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①] 他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正纷纷逃往欧洲,他对这一行为表示支持,不久也步其后尘,并因此成为那个最有名的“失落的一代”的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

今天,我们也许还会重提斯特恩斯的那个问题,但是他的回答却不能成立了。他认为是商业文明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把年轻的作家们驱赶到了欧洲。这同当前的情况已不相符合了。如今,年轻人成为宠儿;知识分子如果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毫无疑问会受到青睐和获得必要的资助。年轻人奔向欧洲不是逃逸而是去度假,有时是去参加会议。在今天的美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生活在流亡中。然而,这个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哪里?这是我全部问题的出发点。

我没有举出很多知识分子——我以“年轻的”知识分子为标

---

① Harold Stearns, “Where Are Our Intellectuals?” in his *America and the Young Intellectual*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1921), pp. 46-51.

准，也就是45岁上下的知识分子，这可能令真正年轻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快。当然，我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的。美国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才是我要研究的对象。他们的存在以及发出的独特声音，是那些比他们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

然而，这种说法会产生误导；其实，问题不是道德的堕落而是时代的变迁。知识分子的经历改变了，这的确不是新闻，但是原因还没有查明；而且，知识分子经历的改变所带来的一个起码的后果未被注意，这个后果正产生巨大的危害：这就是造成了公共文化的贫困。

以旺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和旧金山可能像低租金的租房一样罕见。在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前，昔日混迹于城市的大街和咖啡屋里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现在他们已经被高科技知识分子、顾问和教授——这些常人所取代了。当然，这些人也许很有能力，他们的能力可能超过那些知识分子，但他们决不能丰富我们的公共生活。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生活都在校园里，他们直接面对专业同行，而别人既不知道他们，也无法接近他们。这显然是一种隐患，也是一种威胁；今天的公众文化依赖的是正在衰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正在与他们的继承者失之交臂。

在下面各章中我将在不同代的文人中考察这一断裂；我将提供几种可能性并评估一下失落的代价，仅此而已。当然，面对如此宏大的一个主题，一本小册子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将跳过其中的大部分，讨论某些部分。

这里我不去谈论那些展示大千世界的小说家，我要涉及的是非虚构小说，特别是文学的、社会的、哲学的以及经济的思想。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这些思想中，我相信一代代人之间的断裂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也非常有害。我这里排除了音乐、舞蹈、绘画、诗歌以及其他艺术。不可能有一种单一的研究适合于所有的文化形式。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脱离社会离群索居；我以为对其他领域做批判性的和断代的考察也许也不无裨益。

比如，小说涌进大学——"创造性写作"的中心机构及作家的"栖身处"建立起来；学院派的或英语系的小说异军突起；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先锋派的缺席——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晚近的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面临同样的压力。拉美人、东欧人以及黑人妇女的小说显得日益重要，这表明创造性的活力在外部和边缘涌动，在写作中心，中心和边缘的界限正在消解。

然而，虚构小说要比非虚构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也许因为诗人和小说家始终是偶尔被关注的局外人，所以他们捡一些桌上的面包屑就可以维持生计。① 大量的小型文学期刊——有时它们被称为"小"杂志，刊登小说和诗歌，表明想象性的文学十分繁盛。

然而，即使是"小"杂志最扣人心弦的东西也不是经久不衰的；过多的期刊杂志都是些受到资助的胶印廉价副产品；这些期刊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和方向。它们只刊登小说和诗歌，而且，与以往那些知名期刊不同的是，它们还是文化碎片化的见证。正如小型文学期刊的一个协调人指出的，现在没有什么小型文学期刊能"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散文，甚至书评及书信变得越来越稀罕"。眼下，它们似乎正致力于缝合当下那四分五裂的边缘。②

---

① 即使是成功的小说家也必须靠写作增加点收入。see "For a Young Novelist Success but No Rich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1986, p. C19.

② Michael Anania, "Of Living Belfry and Rampart: On American Literary Magazines Since 1950," in *The Little Magazine in America: A Modern Documentary History*, ed. E. Anderson and M. Kinzie (Yonkers, N. Y.: Pushcart, 1978), pp. 12-13. 这是对小杂志的现状和命运极其精彩的概述。

我的概括是以美国(及加拿大)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排除在国外出生和受教育的人(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夫妇、汉娜·阿伦特夫妇、威尔海姆·赖希夫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影响——事实正相反——将他们排除在外仅仅是为了筛选出美国一代人中的精英。一旦被排除在外,他们巨大的影响便会略显端倪。我所要讨论的知识分子们并不等同于整体。选择哪些知识分子并非必然,通向时代精神的道路并非仅此一条。知识分子的生活没有清晰路线;当文化本身含混不清时,要求精确也就是在苛求一种倾向于琐屑的研究。有关迷失一代的讨论,要求一个全面而透彻的说明;这意味着需要仔细研读一些作家而忽视另一些作家。这必然要把几代人闪光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们长久以来是文化造假的维系者。这也意味着有犯错误的危险。

我将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几代人、文化生活。但我并不想竭尽全力地作一些界定。太多的定义、太多的谨慎会消灭思想。当代的分析哲学为创建健全的概念方法努力了几十年,却无法产生思想。它那苍白的实例记载当然不能避免毫无根据的判断。我相信,认真细致地考察,我们可以了解过去几十年、几个时代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探究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著述,有时可能显得不太礼貌,而且我论争的是大学对文化生活的冲击,所以我必须申明:我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写此书的。当我说"他们"或"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是指"我们",我研究"消逝"的一代,事实上也在探讨我这一代人。当我对学术成就提出质疑时,我也在检讨我朋友的及我自己的著述。我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在一个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我常阅读一些学术专论和期刊。我热爱大学图书馆,那没有尽头的书架和宽大的期刊阅览室都使我心驰神往。我已经任教于好几所学院。我决不想把自己假扮成一个不同凡响

的人。我对消逝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是一种自我批判。

然而，我还是要补充一点，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学术圈内的人。十几年里，我已经游走于七所大学并涉猎了好几门学科。我不止一次地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也许我还得申明，这本书的撰写既无基金支持，也没有大学的资助；我不会感谢那些研究助理和研究生，也无需感谢未曾给予我支持的这个或那个高级研究中心。

冒着作虚假宣传的风险——自称什么事物比其本身更有争议性——我要申明：大概不会有人完全赞成这部书中的观点。它破坏了传统的忠诚。我的朋友们，我们这一代，还有我自己，都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牺牲品。我赞美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我相信他们已经放弃了很多。我将老一代知识分子作为衡量的尺度，他们的工作是我经常批评的；我看中保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贵的生机掩盖了没精打采的虚伪和冲突。如果尚未思考就赞誉朋友和现成的观点，思想就凋谢了。

最后我要申明：书名，“最后的知识分子”，我故意用这个含混的字眼——它指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也指刚刚过去（好比去年）的一代，暗示不久将出现的另一代人。我既不抱乐观的态度去写，也不作为一个纯粹的观察家去写。正当我完成这部书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书在各地涌现，每一部都是对一门学科的挑战——像《政治学的悲剧》、《经济学修辞》、《国际研究和学术事业》，还有《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①] 这些著作并没有坚持一种单一

① David M. Ricci, *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Donald N. McCloskey,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aul A. Attewell,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Sixties: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alysi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4).

的立场，但它们显然不满于过分的专业化；在我看来，这里面暗含着一种也许是姗姗来迟的重建公共文化的颠覆性力量。

还有其他一些迹象。有一种东西困扰着美国的大学，或至少是大学教授：这就是厌倦。一代知识分子在60年代中、后期进入大学，那时校园里生机勃勃；今天，这些教师们即使不是垂头丧气，也是一脸倦容。一项报道表明，学院和大学的教授们为近40%的人已经或打算离开学术界而"深感烦恼"①。这种潜在的不满可能已经呈现出来，重新和公共生活连接起来。保守派注意到并惧怕这一点；因此他们继续对想象中的来自大学的威胁不断攻击。我认为他们错了。但是，我希望他们是对的。

① Robert L. Jacobson, "Nearly 40 Pct. of Faculty Members Said to Consider Leaving Academ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October 23, 1985, p. 1.

第一章　消逝的知识分子？

一

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同时识别一个新的物件——一盏灯，一幅画，一面钟——这是一种日常经验。但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并立刻指出最近刚搬走的东西就很难做到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添加了什么，却不太容易注意到“减少”了什么，比如物体和声音的消失。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意识到它们已不复存在。也许，有一天一进屋我们便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不适：什么东西消失了，可那是什么呢？

本书讨论的是文化中的一种缺失，即年轻人声音的缺失，或许是一代人的缺失。少数——极少数——在 35 岁甚至 45 岁以下的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美国知识分子已经很少引发什么评论了。他们之所以容易被忽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缺席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时间、慢慢消失的；而且一去不复返了。这已为时晚矣——这代知识分子已老朽得无法出场了。

这是一个过去几乎没有讨论过的问题，如今却激起了热烈的

反应。作家和编辑退却了,他们好像受到了侮辱。今天的青年作家——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难道不如过去的作家那么有才华和魄力吗?被激怒的教授们列举出了在他们的领域引起轰动的知识分子少壮派。左派人士退却了,他们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带着怀旧的心情谈论着即将成为历史的那一代人。那些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年轻激进分子,难道不如过去的激进分子光彩照人,甚至队伍更壮大吗?最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刊登的献给纽约知识分子的一曲挽歌,激发了一些愤怒反响:知识分子的生活正在纽约以外的地方日益兴盛;没必要为曼哈顿知识分子的衰落感到惋惜。60年代使他们过早地衰老并退居二线。这没什么不好。①

这是黑暗中的啸鸣。我一开始就应该说明:说到消逝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中伤某一个具体的人。这里不涉及个人的正直和才华;也与任何具体的作家和艺术家无关。很多复杂的因素都在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打下了烙印;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努力想唤起、激活他们枯竭的生命,可是我们都失败了。然而,比起这个有趣的发现,还有更多关系重大的问题;公共文化的活力才是问题所在。

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论题,至少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问题。有关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和激进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消亡已经谈得很多了。当然,新保守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和激进主义的衰弱是和政治现实的变化相对应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在白宫用膳;他们受到公众的青睐、承认,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我这么说也许会让人满意——此书旨在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做

① James Atlas, "The Changing World of New York Intellectual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25, 1985, and replies; Alexander Cockburn, "Beat the Devil," *The Nation*, September 7, 1985, and Ellen Willis, "Atlas Shrugged," *Village Voice*, October 1, 198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一个全面的解释：年轻的知识分子，总的来说比新保守主义分子更激进，他们常常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忽视；他们和时代不合拍。也许。但这么说可能又让人费解。和 50 年代相比，左派已经很活跃。马克思主义教授们在各地授课；激进分子发表无穷无尽的言论；更广大的左派几乎不怕麦卡锡主义的压制。然而，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似乎在公众中消失了。为什么？政治现实不容忽视，但更深的思潮——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生活。

一代知识分子是“看不见”了，下这么一个结论是困难重重的。人们似乎接受了“媒体”——报纸、书评、电视问答节目——的评判并信以为真；这有混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混淆电视曝光和知识分子真正的影响力的风险。媒体几乎不可能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它一向趋附于金钱、权力或戏剧性事件，而对无声的才华和创造性的工作无动于衷。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作家们、评论家们就曾谴责出版社歪曲了文化生活。公共领域比起市场来讲，更少自由市场的观念，它显现出来的只有市场的力量。①

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那么我的观察判断很容易变为一种陈词滥调，也就是说，统治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研究沦为经济学。包含书籍、文章、杂志、讲座、公共讨论，或许还有大学授课在内的知识分子生活，显然从属于市场和政治势力，但不能缩减为仅是市场和政治势力。网络电视或全国新闻周刊对文化生活的冲击也不能低估；然而，这些还不是我研究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城市的重建、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结束、大学的膨胀，这一切也都给文化增添了活力。它们理所当然地也都是我研究的重要主题。

---

① See John Keane, *Public Life and Late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我关心的是把普通的或有教养的人当作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思想家。显然,这就排除那些其作品太专业或太深奥而无法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有人认为,当公共文化衰退时,那些不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私人知识分子"——就会茁壮成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神话。"私人的"和"公共的"脑力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至少可以说:它们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那些伟大的人物,从伽利略到弗洛伊德,他们并不满足于"私人的"发现;他们寻找并发现了公众。如果他们距离我们太遥远、太高不可攀,那么就拿最后一代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毫无疑问,他们也还是拥有公众;而后继的一代就做不到了。

当然,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也许不会拥有公众了。公众在最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抢购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并为他的演讲喝彩,或是站上几个小时听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辩论的公众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当公众越来越喜欢电视的时候,他们关注的范围便缩小了。[①] 爱读书的公众也许再也没有了。如果说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缺席了,那么,那些消逝的听众有可能会说明为何如此。

这是真的,但又不是全部的事实。读严肃书籍、杂志和报纸的公众已经不多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到丹尼尔·贝尔,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还能诱发人们的兴趣和讨论,这说明还有公众在。公众人数可能正在减少,但年轻的知识分子确实都消逝了。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而不是公众的消失。

准确地说:在过去的 50 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

① See 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ew York: Viking, 1985), pp. 44-63.

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是，为有教养读者写作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渐渐消失了；的确，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以往常常为小刊物写作；但这些刊物，只要还有希望，都面向一个庞大的社群。“我们把艺术视为生活的一部分，”1917 年，充满活力的文化月刊《七种艺术》的编辑在辞别社论上这么说，“艺术是经验和想象的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根源。”[①]投稿人都把自己视为男女文人，看重并追求一种简约的文体。他们为各地的知识分子及支持者写作；这些刊物规模虽然不大，毕竟是面向世界的。通过这些刊物，作家便可能得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公众群，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一些小杂志上训练过以后，马克斯·伊斯门或德怀特·麦克唐纳或欧文·豪得以轻而易举地转向较大的刊物和公众。

今天，非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是处于危险之中的一类人；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冲击严重地破坏了他们的环境。他们继续在文化界露面，因为他们掌握着公共话语。新的学院人士的人数虽然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们没能拥有为公众熟悉的语言，所以局外人也很少知道他们。

学院派人士为专业刊物写作。同那些小杂志相比，专业刊物

---

① Cited in James Gilbert, *Writers and Partisans* (New York: John Wiley, 1968), p. 36. 对《七种艺术》的讨论, see Arthur Frank Wertheim, *The New York Little Renaissan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76-83.

的读者相当有限。这不是一个发行的问题——事实上,那些专业期刊都有固定的读者群,其发行量要远远超过小规模的文学评论刊物——而是和一般公众的不同关系的问题。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聚集在年会上交流论文,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艺术史家的著名是相对于同行而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知识分子既然成了学院派人士,就没必要在公共读物上写文章了;他们不写,最终也就不能写了。

老一代知识分子以不可言喻的方式把知识传给了后代,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梦想和希望留给了后代,这种文化的传送带正遭遇威胁。更为宽泛的文化传播有赖于人数正在减少的老年知识分子,这些老年知识分子又没有接班人。年轻的知识分子被大学生涯完全占据了。他们的专业生涯成功之时,也就是公共文化逐渐贫乏衰落之日。

对消逝的知识分子的考察颇有讽刺意味:从公共生活中退离的知识分子大多是那些 20 世纪 60 年代的成年人——那会儿正是持续了近 15 年的动荡时期。这些群众运动的老手们过去经常把大学作为他们攻击的靶子,谴责他们的老师,并嘲笑过去的思想家,今天他们怎么会变得比老前辈更平静,干上大学教师这最严肃的职业呢?我不给出惟一的或简单的回答,然而,这个讥讽暗示着大规模的文化重建。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时,大学从根本上囊括了一切知识性工作;一种在校园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显得不切实际。此后,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没离开过校园;还有人发现,除了学校就找不到别的去处。他们成了激进的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女权主义理论家,但算不上是公共知识分子。

我们是如何推断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缺席呢?当然,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想一想,就会发觉那里的确是一片空白。举出一组重要的、年轻的美国批评家、哲学家或历史学

家，这也许靠不住；他们的名字都不响亮。然而，要说出“青年”知识分子的名字并不总是困难的。一度作家们、批评家们习惯于抱着成见探索新的一代人；他们可以提出新一代人的很多名字，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尽管对他们的德性却说法不一。今天，即使是一份最简洁的名单中也会出现许多空白：重要的年轻的批评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

可是回到50年代，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活跃的批评家，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玛丽·麦卡锡、菲利普·莱福、C．怀特·米尔斯、德怀特·麦克唐纳、莱昂内尔·特里林、大卫·里斯曼、欧文·豪、小亚瑟·施莱辛格、埃德蒙·威尔逊、路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锡德尼·胡克，还有其他无数的人。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朽著作：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保罗·古德曼的《成长的荒诞》、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C．怀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威廉姆·H．怀特的《组织人》以及麦克尔·哈林顿的《别样美国》。

我简单列举这些著作及其作者，是想说明两个震撼人心的事实：占领着当今的文化巅峰的还是这些著作和这些作者，很少有别的著作或作者进入这个巅峰。今天，25年过去了，我们还在继续倾听早在50年代就受到关注的那些知识分子，如诺曼·梅勒、丹尼尔·贝尔、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或高尔·维达尔给我们阐述的理论和思想。

当孤独的年轻知识分子出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联合起来向老一代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挑战，甚至没有人能对老辈作者的思想有所补充。他们通常露个面就销声匿迹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岗位上掌三十几年大权——从50年代到80年代——是令人惊

讶的;在一个以青年人及自身的生机勃勃为荣的社会里,这同样是令人震惊的。当日趋老化的美国工业设备引起大量的话题时,知识阶层的老化却没被注意。人们不禁要问: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哪里呢?

十多年前,一个研究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对年轻的思想家和批评家的缺席发表了评论。查尔斯·卡杜辛发表了他对美国思想家所做的广泛的经验主义研究的成果;他想归纳出——指出并描述——美国"知识精英"的特性。为此,他采访了 110 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人所知,因为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期刊上,诸如《纽约书评》、《评论》、《哈泼斯》、《大西洋月刊》、《纽约人》和《纽约时报书评》等。①

卡杜辛在研究中收集到了很多有趣的和不那么有趣的资料,包括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的名单。1970 年的 10 名重要的知识分子是:丹尼尔·贝尔、诺曼·乔姆斯基、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欧文·豪、德怀特·麦克唐纳、玛丽·麦卡锡、诺曼·梅勒、罗伯特·西尔弗斯、苏珊·桑塔格,以及并列第十名的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埃德蒙·威尔逊。② 除了桑塔格(1970 年她 37 岁),其他人谁也不年轻。即使知识分子的名单扩充到"前"70 名,其中还是没有青年人,这使卡杜辛深感烦恼。应该说,他的研究方法并没有错。

"[名单上]没有青年知识分子,这个事实不是一个'错误',它反映出这一时期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结构,"卡杜辛总结道。青年知识分子只是没有出现在文化生活中,哪怕是某个时期。更有甚

① Charles Kadushin,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Elit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② 罗伯特·西尔弗斯,《纽约书评》的编辑,这个名字在这里出现有点怪:通常情况下,他不是一个主要的知识分子,尽管他是一个有名的编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